

《南昌工商史料》

第一辑

南昌工商史料

中国民主建国会南昌市委员会
南昌市工商业联合会
工商史料编辑组



前 言

南昌市是江西省会，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浙赣、南浔铁路交会处，解放后江西新建鹰厦、皖赣等铁道，水上机轮如织、航空四通八达。南昌市是省交通枢纽，是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昌市革命历史悠久，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世界闻名革命英雄名城。1949年5月22日解放，全市工商业从此日益繁荣昌盛，南昌市成为东南重要的工商城市。

追溯中国近代史，战乱频仍，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经济于十九世纪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部萌芽，南昌市商会组织在逊清光绪27年（公元1901年）才开始成立。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连年，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掀起反人民内战，江西曾经是内战革命战争的中心。南昌民族工商业就是在三座大山压抑下，艰苦创业，惨淡经营，挣扎图存。抗日战争时，南昌沦陷，市区破坏严重，工商业全部撤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工商业者纷纷重返家园，主要市场仍在中山路、德胜路（现名胜利路）及翠花街、万寿宫一带，看去商肆万家，鳞次栉比。这时，工商业虽然稍有发展，但工业仅有碾米、翻砂、机修、纺织、针织、小型化工以及手工艺品、竹木作坊、小营造业等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中、小型工业。解放前，南昌市实际是一个消费城市。

解放三十七年来，市区生产建设突飞猛进，城建面积增

长十倍，南昌市已蔚然成为一个现代化工商业城市。原工商业者，在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启迪下，所经营工商业大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现在原工商界人士大都年事已高，在安度晚年中，感于“夕阳无限好”，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需要，回顾我们私营工商业的历程，总结过去，激励将来，为四化建设服务，撰写工商史很有必要。现在收集在这一辑中的有工商业史，纺织针织业沿革，以及燃料加工、营造业，绸布业，土特产经营，煤油和颜料，西药业的兴衰，商界耆宿的业绩等等，有些重点史实，因年代久远，老一辈人幸存不多，有待深入调查收集，正在努力“抢救”。

二十三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倡导整理文史资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本辑所刊各篇，均实人实事，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第一手资料，有翔实丰富的内容，它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巨塔中几粒细沙，期能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有所助益。

本辑资料中欠缺、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今后随时订正。

南昌市两会工商史料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 南昌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纪实
.....张名儒 王松年 (1)
- 江西省工业协会产生与经过
.....曾逸凡 (10)
- 南昌市“商社”社史
.....曾逸凡 王松年 (14)
- 南昌市绸布业情况回顾
.....江协廉 (19)
- 南昌市郊邓家埠织布业兴衰史
.....陈瑶生 (27)
- 解放前后南昌市建筑行业的变化
.....舒天锡 (33)
- 南昌市图书业今昔
.....朱甫义 (37)
- 南昌市织袜行业的兴起与变迁
.....杜汉卿 (43)

南昌市颜料业的历史概况

.....胡华辉 (47)

南昌市西药业的发展概况

.....魏志诚 (53)

樟树国药局创办经过和经营特色

.....杨寿祥 (57)

我创办煤球厂的经历

.....曾逸凡 (65)

王德興先生的为人处世和致富之道

.....彭寿山 (69)

南昌金融界巨子余建丞

.....姚肖廉 (74)

傅绍庭先生经营“洋油”发家史

.....姚寿山 (79)

王宝之，王绥之兄弟经商纪实

.....王华澧 王忠槐 (87)

周扬禅的生意经

.....彭寿山 (91)

商界耆宿熊养泉事略

.....曾逸凡 (94)

南昌市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纪实

张名儒 王松年

一、解放前我市工商业概况

南昌是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浩劫。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侵入南昌，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把工商企业迁至吉安、赣南一带，也损失惨重。因此，解放前的南昌市资本主义经济既与全国各地有共同之处，又有其自己的特点：

第一、工业生产十分落后。解放前民族工业有四十多个行业，中小型工厂和手工业作坊有八百余户，大部份都是生产轻工业产品，其中有机机械设备的约百家，半机械半手工厂式的作坊有一百七十家，纯手工业户约五百家，工人总数约伍千人，其中手工业之中有业主参与生产的劳动者。民族工业生产是十分落后的。

第二、投机性十分严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恶性通货膨胀发展到了顶点，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为投机者提供了冒险的乐园。解放前南昌市金融业畸形发展，绝大部份工商业都直接或间接与金融业发生关系。当时全市有民办的银行、钱庄达40多户，其中以王德舆的源源长银行和余建丞的义昌仁钱庄业务最大，资金雄厚。源源长银行及其联业贸易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长沙及省内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十余

处。义昌仁等多家钱庄均经营盐业，专门从事囤积居奇，抢购物资，牟取暴利。工业生产经常处于半停工状态，主要靠抵押贷款抢购原材料进行投机活动来维持。

第三、企业规模十分狭小。工业以手工业作坊为主，略具规模的工厂仅有新生纺织厂、振华、新中、厚成、建业、三五染织厂；印刷工业有铭记、合群、长江、鼎记；木材锯板业有震华、大陆；火柴制造有南光、豫光；粮食加工有五福、大德、新江南面粉厂和大利碾米厂；此外有合兴锅炉厂、华中煤球厂、永安皂厂、沈三阳、老同兴酿造厂、大陆榨油厂等数十家。商业除李祥太、大隆、国太绸布店、沈三阳、沈开泰食杂南货店、万象、大新、鸿太百货商场等规模较大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也是属于中小户。

第四、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浓厚。全市工商业经营均依赖上海市场，上海市场受到帝国主义经济的控制，因此，南昌市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带有严重的半殖民地性质。市场经济活动，物价涨落，商品进出，均以上海“金、纱”（美钞，黄金和美棉、美纱）为准。同时又带有半封建色彩，部分较大的工商业者兼有农村土地，在行业组织中以籍贯为范围，形成了奉、靖（奉新、靖安）吉安帮和省外安徽帮、广东帮、江浙帮达15个之多。另有星期六聚餐会、商社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在旧省、市商会理事长的人选上均以当时统治者的意愿、利害为转移。抗战前熊式辉任伪省府主席期间，省商会由旧派人物为理事长，1940年抗战期间，省主席易人，新派击败旧派当选为理事长。

第五、剥削手段也很厉害。民族资产阶级承沿了封建剥削的一些手段，对工人、店员进行剥削，不少工人除了吃雇主饭以外，几乎没有固定工资。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一般

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有少数工厂竟达十五小时之多。不少厂店还雇用童工和包身工，整天在工头、管事监视下劳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每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被请“坐上”遭到开除的厄运。

南昌市的民族资本家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一面。抗战初期，南昌市商会成立抗敌后援会，工商界人士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如绸布业李祥太的邓宁之、同义兴的吴鼎和、恒源仁的周子实等既是商会委员，又是抗敌后援会的委员。当时工商界投入抗日救国的具体行动有：

坚决抵制日货。当时日货充斥市场。例如：绸布业经营的双童衣直贡呢、闲庭吹箫漂布、喇叭童细布，以及条漂、花标布等都是日产商品，经同业公会作出决定，从芦沟桥事变起，一律禁售日货。特别严禁从外地运来改头换面投入市场销售，一经查出以没收销毁，且给以重罚。

利用商店橱窗，开展抗日宣传。所有大马路商店橱窗都张贴标语陈列画片，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斗争道理，以激发广大群众抗日爱国斗争情绪。

开展抗战捐献活动，当时家家户户除捐献现金外，还大量收集废铜旧铁支援抗日战争。

“宁为饿殍，不作顺民”。绸布业各大户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就不断交换意见，作好撤离南昌准备，后来除少数迁回安徽、浙江原籍外，绝大部分撤至赣州、吉安、太和、南城、南丰、黎川等地，三十六家绸布业无一留在南昌的。其他各行业也是如此，几乎没有什么工商物资资敌，全市实际成了空城、死城。

解放前我市工商界也有不少人表现同情革命，支援革命。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口马当构筑工事，妄图抵

抗解放军南下渡江，当时有江时盛等建筑商向星期六聚餐会一些人传达伪南昌市长唐新命令，想在南昌市工商界征购一批水泥、钢材，遭到大多数人的当场反对。一九四九年春，傅啸先和何序东等在丰城一带组织武装斗争，王德舆接受章伯钧意见，在经济上给予了一些支援。解放前夕，反动派要求南昌市工商界中捐款十万元，修筑城防工事，当即被南昌市商会加以抵制，并通过新商报发表文章，利用舆论反对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五月二十二日南昌解放时，工商界不少人都是笑逐颜开迎接解放军进城。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南昌解放后，人民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工业等为国家所有，并把它们改造成为国营企业。当时，南昌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户有7264户，其中工业1204户，商业6060户。工业以新生纱厂最大，有资金27亿余元(旧币)，有工人488人；商业以李祥太绸布店最大，有资金34亿元(旧币)，职工51人；私营金融业以源源长商业银行资金最多，达72亿余元(旧币)。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全市的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在协助国家供应商品，积累资金，维持就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训练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召开了南昌市工商界代表会议，成立南昌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李善元任主任委员，接收了旧商会、旧工业协会，同时对旧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改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工商业的人民团体。这段时

间，全市大部份工商业者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缺乏正确认识，思想极为混乱，存有怕的思想。在行动上消极经营，极少数人甚至停工解雇工人，出现投机违法，破坏市场的行为。针对这些情况，工商联筹委会大力宣传党的有关政策，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共同纲领》，消除了一些疑虑情绪。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又正确执行了党的“贸易自由，保护正当工商业发展，坚决取缔投机捣把非法经营的工商业”的政策，使正当工商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私营工业由解放前的1204家增加到1855家；私营商业也由解放前的6060家增加到6263家。但当一九五〇年三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后，有些工商业者在抑平物价后出现了关门歇业的歪风。由于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调整了工商业，改善了公私关系，调整了劳资关系，从而增强了工商业者经营信心。经过复查登记发照，申请复开业的户数增多，工商户增加到9109户，其中工业4163户，商业4946户，与复查前8307户比较，多出802户，增加9.7%，资金11,730,570万元（旧币），较复查前的8,500,713万元，增加38%，从业人员达28,089人，增加了50%。紧接着工商联组织大家学习了《工会法》、《劳动条例》、《私营企业暂行劳动条例》，帮助工商业者明确了搞好生产业务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举办了“江西物产展览会”，组织公私企业大规模的贸易代表团，参加了浙江、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华南等物资交流大会，成交金额达五百亿元（旧币），密切了产销关系。在对私营企业进行了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工作之后，资金较重估前增加了61%。这说明南昌市私营工商业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三、我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一九五〇年工商业的调整，带来了一九五一年工商业繁荣，可是工商业者唯利是图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一些不法资本家把政府的照顾当作可乘之机，在经济上发动了猖狂进攻，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泛滥。因此，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开始，在工商界中开展了“五反”运动，通过这场斗争，促使全市工商业者开始认识到只有老老实实遵守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正当合法经营，才有光明的前途，为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五反”运动结束后，政府又采取了相应措施，启发、教育和帮助工商业者积极努力搞好生产、业务，开好劳资协商会议，并推动他们参加南昌市物资交流大会，在“实事求是，积极交流，大买大卖，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大会成交购销数字共达2,340亿元（旧币），南昌市代表团占1,125亿元，其中私商购销也达320亿元，创私商参加交流会的历次纪录。这时，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南昌市工商联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昌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正式成立了南昌市工商业联合会。王德舆当选为主任委员。

根据国民经济改组的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试点。五福面粉厂于1950年四月首先走上公私合营，同年年底新生纱厂、五金制造厂、企业公司酿造厂、钮扣厂、机器厂、建业染织厂又先后进入了公私合营。另有

220户工厂走上了加工、订货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至此，使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4%，品种占32.8%。

从一九五三年起，工商联组织了工商界经常性的学习，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并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间召开了有五百名代表出席，历时八天的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传达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及省工商联扩大会议精神，使全市工商业者普遍受到一次总任务教育，认清了前途，愈来愈多的人表示要“争取利用，接受限制，欢迎改造。”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扩大加工订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靠拢国营经济，推广批购、经销，专业代购、代销、改善经营管理。为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创造条件。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党和政府积极宣传、贯彻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到年底，私营工业纳入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占68.7%，私营商业占68.4%，企业面貌焕然一新，生产业务蓬勃发展。新生纱厂合营前年年亏损，靠卖原料设备度日，合营后一年就盈利几十个亿（旧币）；沈三阳、沈开太、新生酱园等店合营后利润成倍增加，鸿太百货商场长年营业不振，实行经销、代销后，营业额增加了十倍之多。这就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准备了条件。同年十二月间工商联辅导棉布、大百货、新药三个行业申请公私合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正式批准，为全行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公私合

营，创造了范例。

当一九五六年一月传来北京市批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消息时，我市工商业者非常兴奋激动，奔走相告，纷纷酝酿申请，政协南昌市委员会于一月十八日召开了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指示，经过学习讨论，使工商业者进一步看清了前途，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全市工商业者以自报增资二十余万元的实际行动拥护公私合营，在五天中，全市七十个行业共7531户全部都提出了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在一月二十五日工商联会议最后一天上午九时20分这个难忘的时刻，张云樵市长在工商联礼堂上，代表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宣布：“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掌声、爆竹声响彻云霄达三十分钟之久。

紧接着就转入了清产核资和人事安排工作。在清产核资中，按照自填、自报、自估、同行互评互审、工作委员会核定三个步骤。纠正了某些偏高偏低的现象，在四天内就完成了清产核资工作，贯彻了“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原则，使全市工商业者都感到满意。在参加申请的7531户（人）中，除去个体户3196户走上合作集体化外，实际参加合营的为4,335人。再除去倒挂户和没有股金的资方代理人外，实际定股的为2,960人，股金总额为832万元。工业股金最多的为太丰搪瓷厂（内迁厂）定股42万余元，最少的仅十四元；商业股金最多的是李祥太绸布店李文经为十二万余元，最少的仅五元。同时，进行了人事安排，在工业方面先后被任命为经理、厂长的43人，正、付股长、主任34人；商业方面被任命为正、副经理226人，正、副股长、主任12人。至此，生产

资料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了，剩下定息这个剥削尾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也取消了。

这一切，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的那样：“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江西省工业协会产生与经过

曾 逸 凡

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朝，可是军阀混战，迄无宁日，那时既谈不上有民族工业，更谈不上有民族工业的团体组织，迨到北伐抵定，社会较为安定的时候，我国有些有识之士，眼见一盒火柴、一双线袜、一颗元钉、一滴煤油都是外商经营或来自国外，无不打上一个“洋”字，叫做洋火、洋袜、洋钉、洋油……等等。利权外溢，造成民穷财尽，百业萧条。慨叹及此，才有着振兴实业，富国裕民的设想。因而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民族工业，逐渐崛起，内地工业虽也有了一些萌芽，但都处于手工业的状态。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军兴的时候，我国民族工业虽有过一段蓬勃发展和到处开花的热潮，然而终因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使民族工业昙花一现，又复生产停滞，一蹶不振。

从整个民族工业来说，主要集中在上海，因而上海一些从事实业界人士，如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吴羹梅等，有鉴于我国民族工业势单力薄，岌岌可危，必须有一个团体组织，促进和维护民族工业应有的发展，因而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工业协会，当时是由上海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担任理事长，吴羹梅、刘鸿生等担任常务理事，并发行了《工协》刊物，吁请当局和社会对民族工业的重视和支持。

江西工业协会的成立，首先是在一九四五年由上海工业协会聘请江西省建设厅长胡嘉韶担任理事长，在太和成立江西工业协会筹备会，嗣后因胡是现任官吏，不能兼搞团体职务，于是在一九四六年通过选举，在南昌正式成立“江西工业协会”，选举了余行鲁为理事长，王德舆、魏天骥、曾逸凡、徐劭文、朱达之等为常务理事，何维华、胡会恩、邓谓之、涂绪辉、段星如、黄省庵为理事（具体人员记不全）总干事一职先是王序灏，后是娄宝书担任。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工协》及各地《工协》吁请下，才正式颁布了《工业会法》，承认民族工业企业可以组织工业会，因而江西工业协会也随着改为江西工业会，成为民族工业正式团体。

江西工业会是一九四六年正式成立，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江西工业会并入南昌市工商业联合会，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在新旧交替的几年期间，它为代表民族工业利益和交流情况，以及解放后为支援解放事业起了一定作用，主要有以下一些工作。

（一）调查登记掌握情况。对江西的民族工业状况，（主要是南昌市的工业情况）进行了调查登记，根据南昌市工业薄弱的实际情况，分为50人以上的为大型工业，50人以下的为中型工业，30人以下的为小型工业。如此分类，利于掌握基本情况，便于为会员申请和担保工业贷款，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工业得到应有的巩固和发展。

（二）交流经验，促进发展。在同类会员之间，召开了一些小型座谈会，如纺织专业研究会等，沟通经济交流，促进技术提高，并通过工业会组织，为加强各方面的业务联系和改进经营管理，起了一定作用。

（三）创办刊物，制造舆论。在这期间创办了《江西工

协》刊物，不定期出刊，主要代表民族工业吁请政府对私营工厂给予重视和扶助，并通过刊物，交流技术资料，改进产品质量。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还专门出了一期《抗战损失赔偿专号》刊登了工业界人士控诉日本侵华暴行和要求日本赔偿的文章，该刊物后因经费困难，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对舆论的控制，只办了三、四期就停刊了。一九四九年四月，工会集资，由余行鲁担任发行人，创办了一种四开版的《中国工报》，想利用它来作为民族工商业讲话的喉舌，只出刊了一个月，因为金圆券贬值，资金无法周转而停刊。

（四）控诉日寇，要求赔偿，由工业协会出面组织《抗战损失赔偿委员会》。抗战结束时，按照几个大国协定，日本的一些工厂，应该拆迁到中国来，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中国浩大损失的赔偿，而美国占领军却反对把日本工厂拆迁。为此，全国民族工商界，纷纷起来进行全国性范围要求赔偿的斗争，江西方面则由工业协会组织的《抗战损失赔偿委员会》主持这件事，召开了一些会议，发出呼吁，争取把日本部分工厂，搬迁到江西来，以赔偿江西在抗日战争中所受的惨重损失。由于国民党政府始终敷衍应付，致毫无结果。

（四）组团访台，参观考察。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省，在抗战胜利后，回到祖国怀抱。一九四八年初，由工业协会组织了一个《江西省工业访问代表团》到台湾进行参观访问，团长余行鲁，副团长魏天骥，团员有曾逸凡、周扬禅、徐劭文、黄省庵等十余人，编印了两本介绍江西省资源状况和南昌市工业概况的小册子，带往散发，争取外省投资，发展我省工业。到台湾省受到当局和工商界的重视和热情接待，相互交流了两省工商企业的情况，讨论了开展两省